

DUKU

读库

0905

DUKU

读库

0905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 0905 / 张立宪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225-783-2

I. 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503 号

读库 0905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 × 925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83-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01-08	毛以后的中国	刘香成
09-12	实事求是	刘香成
13-49	中国：1976-1983	刘香成
50-84	冰雹喇嘛	书云
85-114	我走到那里在风起以痛	刘春
115-181	我是六零后（续）	荆方
182-247	胡适的格言	魏邦良
248-273	挖挖《守望者》的蛋	陈腊
274-287	“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	张铁志
288-306	希特勒的财神爷	孔笑微
307-317	姓刘的匈奴	刘勃

毛以后的中国

刘香成

1976年到1983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改革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

编者按 1976年至1983年，美籍华人刘香成先后以《时代》周刊常驻北京记者和美联社首位驻北京摄影师的身份，作为外国媒体唯一一位在北京的新闻摄影师，为当时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剪影。他在那段时间的摄影汇集成为《毛以后的中国》，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先后再版四次，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文版本《中国：1976—1983》，是作者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全新编辑而成。本辑《读库》特选刊作者的两篇自序及部分摄影作品，以飨读者。

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长期往来于中国的岁月中，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三百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



1983年，北京故宫，七十六岁的溥杰——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在他以前的居所——故宫里。“曾经，”他安详地说，“我就住在这里。我是最后的满族人。”

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四只麻雀一天能消耗五百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

“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尽管被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二十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如何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与中国的接触就已经在震惊中开始。1976年的大地震将唐山摧毁，就连唐山以西一百五十公里的北京也有

震撼。消息传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欧洲拍摄在里斯本作竞选巡回演说的葡萄牙共产党候选人。随后，佛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传来，我前往西班牙拍摄社会党候选人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ippe Gonzalez）。当时他正领导学生集会，要求结束西班牙的佛朗哥时代。接着在巴黎，我计划拍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却在离开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从当日《费加罗报》（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泽东已经离世，就联系了在纽约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为我搞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但我进入中国后却滞留在了广州，于是我开始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从这里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

四年后，我加入美联社。1980年，美联社北京分社由传奇人物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领导。罗德里克是美联社资深的首席记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1971年，他被指派报道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的访问——也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为1972年里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的里程碑式的访问铺平了道路。后来，周恩来告诉罗德里克：“你打开了大门。”

很自然地，当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时，美联社便委派罗德里克从东京前往北京，重建新闻分社。在罗德里克的游说下，我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间，后来又成为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派驻洛杉矶的新任命，带着我的家人离开北京。在北京旧机场，我的司机小张对我说“再见”，那是一次让人感动的告别。小张是一个大个子，有些腼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话逗乐。他由中国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委派到美联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机。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断在外奔波，随时准备奔赴新的消息来源进行拍摄，因此他几乎成了我的专职司机，长期伴我左右。我们通过西单电报大楼把每张照片归档，将做好说明的照片送往邮电部办公室，并由无线电传往东京分社。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美联社分社才获准使用自备的图片传送机将新的图片直接传送到东京和纽约。1981年，中国许多军工厂被解散，工人们制造的产

品被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购买了一辆带挎斗的国产三轮摩托车，它的原型是德国的宝马摩托车，后来通过东德和苏联进入中国。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小张替我找来一位驾驶老师。可惜的是，在尝试了三次路考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由公安系统签发的车子执照：他们只给汽车发黑牌，不办理摩托车牌照。

在中国女排战胜美国队的那天晚上，我去天安门广场拍摄随后的群众游行。就在按下快门触发闪光灯的瞬间，兴奋的群众把我从我所站的交警指挥岗抛入空中。我落入人群，压在了好几个人身上。第二天，小张让我签署一份报告。我自己当时没有发现，而他告诉我，欢庆那天晚上有人往我的衣服上泼硫酸，几乎毁掉了我的外套以及车子的座椅和白色的棉布座套。小张担任着我可靠的司机，直到1984年我们在机场分别。

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姚伟曾叫我参加过一个会议。他告诉我，他们调查了1979—1981年外国媒体的活动，发现西方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照片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由我拍摄的。对这个数字以及他们调查的认真性我很是惊讶。实际上，关于已发表的照片，这样一个数字并不难获得，因为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是北京唯一一个外籍新闻摄影师——1981年，合众国际社的迈克·提勒（Mike Thieler）才加入进来。更让人惊讶的还是他们的反应：“刘先生，以后请不要那么努力工作。”

我从未想象过《毛以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企鹅出版社，1983年）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出中文版。我毕生，或者说至少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人，我多么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纵使我知道这终会成为现实。在中国，事情的发生需要时间，这与三十年前中国人民开始现代化之旅而走向世界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本书的出版，不仅是我的一小步，也是中国人民开始回顾毛泽东去世后岁月的巨大标志。与毛泽东的去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相比，1978年承诺的经济改革所施加的新担子，远没有那样沉重和具有挑战性。这个过程恰被随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准确地表述为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

本书所有的照片均拍摄于我在1976—1983年居留北京时重新发现中国的过程中，其中有许多都是工作时拍的。这段时间里我见过的艺术家如王

克平、马德升、摄影师王志平（他是“四月影会”的创立者之一）、作家钟阿城——他们都参与了“星星画展”的组织，并投入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新感觉艺术表达当中。在最近一次与查建英的访谈中（《八十年代访谈录》），钟阿城谈到了“中国历史的断层”。他痛悼中国人民“失去的岁月”，无论是民族还是家庭方面。访谈中他回忆了在北京度过的童年，以及四合院生活的那种悠闲自在。阿城说他主要的教育来自他那位身为著名影评家的父亲钟惦棐，以及在旧书店里的自学。当时新华书店里绝大部分讲述现实题材的书已被撤掉，阿城便在专卖旧书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东西看。他没能逍遥多久，在下乡插队的大潮中被分配到云南当了农民。九十年代初，我在洛杉矶再次遇到了阿城。我记得他描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就像一架自动机器。我还记得他提到修理一台老式的德国大众甲壳虫汽车时的巨大快乐。阿城后来成了享誉中外的作家。经过旅居欧美的数年，他明白人类常识仍然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但它们似乎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2000年初他回到中国，描述了所看到的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价值



1982年4月10日，刘香成从美联社北京分社电传往东京分社的照片原件。“北京，美国记者的植树节”：刘香成组织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一道，在人民日报社的大院内植树。

的缺失。本书照片中反映的年代，正是我作为摄影记者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到，先前时代的许多社会政治动荡和创伤便是由于失去常识所造成的。

1976年到1983年的重大事件包括：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捕、邓小平的复出和他旨在恢复被破坏殆尽的国家和国家经济的改革政策。这期间，我带着儿时的记忆和在西方受到的政治科学与艺术教育返回中国。那时这个国家正迈出它最初的试探性步伐，以恢复和重建阿城所称的“常识”。我试图以照相机作为工具，来解释中国这一独特的社会政治历程。

我在那个时代所接受并将始终铭记的感触和印象的更深层面来自于阅读，以及对一本书的永恒追寻，这本书将能提供一种有关中国的洞见，而这种洞见能就中国承前启后的变化的本质加以阐释和说明。有这样一本书与此目标非常接近。九十年代早期，我在巴黎圣日尔曼的一家旧书店里与林语堂的文字重逢，这是一件有趣的事。1936年，赛珍珠（Pearl Buck）在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所写的导言中观察了那些有过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自卑感弥漫全国的时候……他们对西方国家既痛恨，又羡慕。”但最打动我的却是她下面的这段评价，它和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最终我用照相机努力去做的事情产生了共鸣：

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而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她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声音，对此我深表赞同。正如她所指出的：“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在筹备本书的中文版时，我重读了林语堂的这部经典之作，发现自己沉迷于作者在自序中的话：

我会激怒不少阐释中国的作家，特别是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

们。这些伟大的爱国者与我毫无干系，他们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们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我的爱国主义。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是一个没有语言天赋的人，因此我将照相机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避免落入夸夸其谈的宣传。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1978年所采取的那些重大步骤的确开启了重建这个国家“常识”的进程，那是一种曾经暂时失去的意识。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现在我们已无法回头，而我们中那些经历过共和国前三十年生活的人也许能够理解，为何中国人民现今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寻求一个物质上安全的未来。1976年到1983年是少见的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社会缓慢地抛弃它的过去，并思考着随改革政策的深入而带来的新事物。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代，中国人在被要求行动之前真正有了思考的时间。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如此巨大的变革已经发生。有一件事情则仍待解决：中国必须坦诚面对自己近代的历史，真正开始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仅仅拥有悠久而复杂的文明是永远不够的。

2009年9月

于北京

实事求是^①

刘香成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用一部摄影集就能涵盖中国人，但有望通过这些照片帮助人们一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

1976年春天，我开始为我的摄影导师基恩·米利工作，并跟随他学习新闻摄影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帮助米利翻查他毕生全部作品的负片、小样和幻灯片，筹备他的摄影集，度过了许多个难忘的下午。

在我的印象中，基恩从未提及光圈、摄影机或景深。比摄影技巧更重要的是，基恩教会我怎样阐释人类的体验，并将其富含生气地反映到二维影像上去。他让我坚信，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当初我带着《时代》周刊的第一份委任状来到中国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在北京的命运，我将在这里拍摄中国“伟大的舵手”毛泽东的葬礼。当时我被困在广州，旅行社导游告诉我现在去北京可能有点“不方便”。我

^① 本文原为《毛以后的中国》英文自序，该书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

冲到街上，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都在拍摄当地人筹备毛的追悼会。

在平日里中国最轻松的广东人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平常的平静。我不太能确定是什么造就了这种表情。他们曾宗教般虔诚地背诵毛的语录，现在则开始关心自己的未来命系何处。

从那时我便了解到，毛的去世，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十亿中国人预料中的震惊。他们花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没有毛的未来。

此后我多次因公回到中国，停留时间从几周到数月不等。但我很快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中国，了解她复杂的历史，了解政治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制度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要想以影像呈现这个国家，我必须建立各种个人关系，并要付出比一般中国人多得多的耐心。

从1979年秋天起，我作为《时代》的摄影师再次回到中国，不久还加入了美联社。能够说一口汉语和几省方言，的确令我工作起来比其他摄影师轻松一些，但这轻松不宜过高估计。这是一个外国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从未因我的报道和图片而招致政府的阻挠。在中国，我们可以自由地质疑和拒绝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对我来说，这才是出版自由的真正晴雨表。

多年来我与我的中国官方同行之间建立起了良好和睦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审美取向往往大相径庭，并且在一幅好的摄影作品的标准上分歧良多。

1979年8月，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问《时代》杂志北京分社，其间我与蒙代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起参观了北京一家景泰蓝工厂。当我准备拍摄一张母女二人选购纪念品的照片时，一只手伸进了我的取景器，把女士们前面的玻璃盒上的一只烟灰缸调整了位置。

我回头看见了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显然这只烟灰缸扰乱了他的审美构图，使他最终忍不住伸手去移动它。然后，他按动他的禄莱120的闪光灯，拍下了照片。

许多中国摄影师，就像我的这位新华社同仁一样，相信应该像处理一幅传统中国山水画一样去拍一张照片。中国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受关于人与自然和谐观念的影响。这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想必认为烟灰缸破坏了照片的平衡，所以将它剔除出去。



1979年，北京，解放军列队欢迎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访华的仪式上，工作中的刘香成。照片为一位美国摄影师所摄。

一趟山西煤谷口煤矿之旅让我更加谙熟中国式摄影对内容的要求。在拍摄一群满面煤灰的煤矿工人时，一位干部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矿工们不愿被拍成这样，看上去多不干净。”仿佛中国的矿工是世界上唯一一群在六百五十米深的地下作业后仪容不整的人，这位干部建议我等他们洗完澡之后再来拍。

在中国，官方组织的参观往往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工人和农民通常都会被要求提前打扫工作场所，梳洗一番才来迎接国外友人。每次看到“热烈欢迎美国友人”的牌子，我都会想起这一点。

1981年的冬天，我来到哈尔滨。这座粗犷的工业城市矗立在黑龙江南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黑龙江省与苏联共享着三千四百公里长的边界。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看到大约一百名农民跟随在一列卡车后面，每个人都戴着一副朋克太阳眼镜。他们挥舞着大纸扇，载歌载舞，庆祝传统节日春节。当地领导迫切地想让我拍下这群快乐的农民演员那鲜红的脸蛋和嘴唇，但他坚持要我等队伍站好了之后再拍。“没关系，”我说，“这是抓拍。”“什么是抓拍？”他站在我的徕卡面前，友善地问。

决不能以此判定中国人对摄影心怀敌意。我从没有见过哪个民族会这么愿意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大笔的钱用来拍照。从故宫到长城，到天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摆姿势拍照。北京站地铁里有家由一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操持的照相馆，顾客付三角钱就可以在一列火车前拍一张照片。一家有两盏钨丝灯的照相馆甚至为顾客提供装饰用品——女士是手袋和塑料花，男士则是西装和领带。

我可以和中国的摄影师交上朋友，但这并不容易。我曾经邀请四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来我的公寓吃饭，顺便讨论一项摄影计划。其中一位摄影师表示需要跟他的主编商量一下是否方便接受邀请。一个星期后，他电话告知我最好另择地点——显然，我的住所不合适。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我曾在电影《末代皇帝》位于故宫的拍摄现场遇见一位中国摄影师，并邀请他来我的住所进餐。“非常荣幸。”他说。相熟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位高官之子。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用一部摄影集就能涵盖中国人，但有望通过这些照片帮助人们一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挨过了两千多年的贫穷，尽管这个国家仍然陷于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但同时她也被其丰富的文明保护着。一位仿佛对过去的灾难毫无畏惧的四十多岁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曾向我历数过去几十年中所有的政治运动。他数完之后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三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二十五场政治运动。

西方人迷惑了。“什么样的人，”他们自问，“能够年复一年地承受‘教育’与‘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答案是：中国人。

中国：1976—1983

刘香成 摄



1976年，上海，一群小学生在表演“打倒四人帮”。